

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

柳无忌

在今日，经过半世纪以上的时期，苏曼殊的研究已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间，我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每一个时代我都参加工作，虽然并非主要的探讨者。因此，我愿以亲身的经历，叙述此项工作的每一个阶段，概论其成就与限止，并对于整个的苏曼殊研究，瞻望其前途与最终目标。在此，我愿意首先略述一下近年来文坛上一般对于苏曼殊的评价，以及为何我觉得，即在现今的社会内，仍有为曼殊的生平、著作与文学上的成就，作一总结的需要。

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在此新时代内，并没有忽略这位在二十世纪初年曾使读者“倾倒一时”的南社诗人。此处，可以列举1959至1964年出版的三部《中国文学史》，以为例证。在论述“我国文学史第一个革命的文学组织”南社时，各书都曾提及南社的成员苏曼殊，加以大同小异的评品。其中北大文学史称苏曼殊为“当时南社拥有全国著名的翻译家与小说家”之一，并列举他的创作小说《断鸿零雁记》、《碎笔记》、《非梦记》等，以为“由于作者的生活经历，给这些小说染上了僧侣的孤寂”。他那部篇幅最长的《断鸿零雁记》，是一部充满悲惨遭遇的自传性质的小说，书中对于热中名利的留学生，亦曾“给予了无情的讽刺与痛骂。”^① 复旦文学史在“鼓吹革命的南社”一节内，特别注意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及文学、佛学的各种撰述和翻译工作”的苏曼殊，并对他有具体的批评：“苏曼殊是一位有着浓厚的浪漫气质的诗人，他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社会上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影响了他，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飘零的身世，形成了他的复杂矛盾的世界观。”^② 在正的方面，他的诗作有热爱祖国精神，一定的革命思想。但是他没有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徘徊在投身革命与遁迹佛门的岔口上，引起矛盾的心情，使他的一些作品发生反面作用，“涂上了消极颓废，清冷孤寂的色彩。”^③ 最后一部文学史，由游国恩等五位学人主编，在《柳亚子及其他南社诗人》一节内，亦特别提出苏曼殊，说他在文学上“确实表现了多方面的努力和特出的才能”。^④ 他的诗歌交织着“生活的和谐喜悦”与“个人感伤的微吟轻叹”，反映了当时人们，尤其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闷情绪”；他的小说文词清丽自然，情节曲折生动，但亦“带有比较浓厚的悲观厌世色彩”。^⑤

① 北大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论述苏曼殊的文字，共有半页以上所引，均见该书下册。页673。

② 复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华书局，1959），下册，页493。书中有二页（493—495）专论苏曼殊。

③ 复旦文学史，下册，页494。

④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第四册页1227。

⑤ 同上，页1228。

年的事情了。至此，曼殊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遂告一结束。

此时期的其他人士，对于苏曼殊研究有重大贡献者甚多，可列举如下：（1）曼殊亲属：林紫垣（表兄），杨耀垣（妹夫），苏煦亭（长兄），苏维驥（堂弟），苏绍贤（胞姪，煦亭子），都曾供给有关曼殊的血统、家庭情况，与幼年生活的直接资料。他们众口同声，证实曼殊生父为在横滨经商的粤人苏杰生，也承认曼殊生母为日人。但究竟是谁，曼殊自认为母亲的杰生妾河合氏，或另有其人，苏杰生在横滨时所雇下女却有不同的说法。其中苏维驥与柳亚子通信甚勤，贡献最大。苏绍贤有记述“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一文。还有绍贤的幼妹绍琼，在日本生长，为曼殊作品的爱好者，不幸感伤身世，如朝霞一般地自尽辞世。（2）曼殊友人：少年时代在横滨大同学校的同学冯自由，张文渭；先后在东京有来往的陈独秀（仲甫），刘三（季平），秦毓盛，章炳麟等；返国后在上海各地结识的友人，如章士钊，萧纫秋，陈去病，沈燕谋，郑桐荪，陆丹林，胡寄尘等。这许多人中间，冯自由撰“苏曼殊之真面目”一文^①首先澄清曼殊的血统问题，并略述曼殊的亲属及学历；陈独秀修订曼殊所译《惨社会》（Les Misérables, 法国文豪器俄Hugo著）的初稿；胡寄尘为《断鸿零雁记》的流传尽力；章士钊证明“绛纱”与“焚剑”二记为曼殊所作^②；刘三保存大部分曼殊的书信，萧纫秋藏有孙中山题字的“曼殊遗墨”^③；陈去病曾呈请元首（孙中山）为曼殊卜葬西湖孤山，有诗六首，并为曼殊撰“建塔院募捐启”。这些人对于曼殊的研究，都有极大功绩。（3）曼殊死后，为之编印集子，怀忆、追述及研究其身世与作品者更多，兹略举一些重要的作者如下：冯秋雪，周瘦鹃，卢冀野，金织云，时希圣，罗芳洲，文公直^④等；以及杨鸿烈，罗建业（作“苏曼殊草稿”），葛克信，马仲殊，张蓬舟，孙湜（作“关于苏曼殊的点点滴滴”），唐蕴玉（作《惹班时代的苏曼殊及其他》）；还有黄嘉谟（编“断鸿零雁记”剧本），严梦（撰“曼殊的春梦”诗剧）诸人。他们大量的有关曼殊的著作，都产生于这一个阶段，也是曼殊研究的全盛时期。至于柳无忌编《曼殊大师纪念集》（1945），黄鸣歧撰《苏曼殊评传》（1949）的出版，则已介于第一与第二个阶段的中间了。

第二个阶段的苏曼殊研究（1960—1975），已从国内发展到国外：英、美、日本。在此时期，由于国内政治的激剧变动，知识分子已无暇顾及旧中国的文学遗产，甚至对于五四运动期间的作家，亦仅把注意力集中于鲁迅一人。其余的近代文学，变成一片“荒地”，^⑤苏曼殊的研究更不能在这上面滋长。反而，这种工作在国外却有少数的人做着，而曼殊的声名亦因此传播世界各地。

在1960年秋，当我任教匹兹堡大学时，无意中看到一本英文书《Su Man-shu, A

① 柳亚子有《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笺注》一文，考证至为详尽。

② 赵景深据白采言，指此二记为曼殊友人所作。章士钊文“二记俱（曼殊）所亲草，世可得疑。”

③ 收《曼殊遗迹》，由萧纫秋交柳亚子付北新书局印行。

④ 以上诸人，都曾编印曼殊的集子行世。其中以文公直的《曼殊大师全集》（1935）较为后出而最完备。惟书中错误甚多，如以鱼玄机和三姊妹诗为曼殊所撰，以及《汉英三昧集》内“李陵答苏武书”的英译文一篇，及汉诗英译共数十首，认为曼殊之作品，不知这些都是英人翻译，为曼殊自英文书籍所选录而编入集中者。参阅本文后面第28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近代文学研究组，于1977年才成立。

Sino-Japanese Genius》(苏曼殊:一位中、日天才),英人麦克里维 Henry Mcleavy 撰,使我大为惊奇。当苏曼殊的名字已为一般人所忘怀,居然有这么一个英国学人,在有名的伦敦学社(London Society)作着关于曼殊的演讲,并把这篇讲辞及《断鸿零雁记》、《碎簪记》两部小说的节译文,合成一书出版。更引起我的注意,麦氏在文中主要的论点,是以冯自由的“苏曼殊之真面目”一文为根据,来推翻父亲与我在早期(30年前)所作的曼殊身世的考证,如他的完全日本血统,与少年时代的学历——这些他称为“神话”传说。麦氏也怀疑曼殊的一些著作,如《梵文典》与《燕子笺》英译,不相信它们的存在。这种谨慎的考证态度,无可厚非。^①唯一的问题,当时中英文化尚未交流,远在英伦的麦氏,手头所掌握的材料,贫乏得可怜。他非但不知道普及版《曼殊全集》与《曼殊大师纪念集》,连北新版的《曼殊全集》也没有看到。他只从我的《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一书上,大做其文章,殊不知我们早已放弃其中关于曼殊血统与少年时代的资料。麦氏最早介绍苏曼殊于英语人士这方面^②,有首创之功,但其研究成就则至为有限。

麦克里维这部英文苏曼殊书的出现,引起了我对于曼殊研究的兴趣,死灰复燃,并以余烬在异域土壤上垦荒起来。我做了一连串的英文演讲与写作活动,为曼殊大事宣传:在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上,我两次宣读论文:(1)“苏曼殊的真正故事”(The True Story of Su Man-shu),1961,华盛顿;(2)“拜伦‘哀希腊’诗的三种中译本”^③(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Byron's "Isles of Greece"),1966,纽约。我曾应编者之邀,为英文本《民国时期的中国名人传记录》,《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之百科全书》,《东方文学字典》三书,撰苏曼殊小传;并为在纽约印行的世界文学作家丛书,出版英文本《苏曼殊传》(Su Man-shu),1972。这本书在六十年代即开始撰写,以了却我编《曼殊大师纪念集》(曼殊逝世二十五周年)时所许下的一大心愿,即是于曼殊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时,写出一部他的传记。略有不同者,这次是用英文撰写,以继续我在海外介绍这位近代中国文学家的工作。当此书如期完成时(1968年脱稿,1972年印出),我的苏曼殊研究终于告一段落。

就在写作英文苏曼殊传的期间,我交了一位新的朋友,在日本横滨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任事的罗孝明。他就是曼殊研究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人物。我们从未谋面,但书信往来甚勤,他写给我讨论曼殊的信,自1964年至1972年,连续有八年之久。他的身世与曼殊有相似处:原籍广东,父侨日商人,母日本人,生于横滨(1902),幼年在大同学校肄业(1910—1915),后于曼殊仅十二年。他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复回横滨就业,在轮船公司服务有四十余年,1973年逝世。罗孝明与苏曼殊另有一关系,他的生母渡边氏,在1923年日本大地震前,曾与曼殊义母河合氏,有一面之交,知道河合氏曾藏有曼殊的遗著书画甚多。为此,他对于曼殊的研究倍感兴趣,亦致力于曼殊著作之蒐集。他与我一样,想在曼殊示寂五十周年纪念时,有所作为。他有意将《断鸿零雁记》译为日文^④,编成剧本,上演于日本著名的剧院,并利

① “麦氏是一位历史家,他研究苏曼殊,好象考证屈原一般,当他作一个古人看待,而且似乎也把我当作一个古人!”引自我写的《我不认识的苏曼殊》(《古稀话旧集》,页15)。

② 梁社乾有《断鸿零雁记》英译本,于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除此文所讨论的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的三篇译诗外尚有梁启超的译作二章,与胡寄尘(五言诗)及柳无忌(白话诗)的翻译。

④ 后来,他发现北海道大学教授饭塚朗,已有《断鸿零雁记》日译本,于1938年,由东京改造社出版。

用报纸及电视,在日本广为宣传^①。这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仍锲而不舍地做着曼殊研究的工作,其贡献可概述如下。

首先,罗孝明充实了苏曼殊在大同学校时期的材料。他以通信,访问及座谈会的各种方式,与当时尚健在的曼殊在大同的同学,取得联系,如在日本的梁福起,张世昌,在香港的郑宗荣,陈国权,从他们的回忆中追寻六十年前曼殊在校的生活片段。他并觅得一册《大同学校同学录》孤本(冯锦龙编,1909年),书内有大同的校史,插图三张,教职员表,历届学生名单,在那里“苏子谷”的名字赫然出现。第二点,从与陈国权的通信中,他获得一条宝贵的材料,为曼殊在1908年秋(?)^②返日,与河合氏重晤的情况,陈国权就是当时在场的曼殊的日语传译者。^③陈国权为曼殊在大同时代先后同学,其母涩谷秋子与河合氏的好友关安子^④相善,为了这种关系,所以曼殊能信任他,邀他协助。也为了这原因,陈国权对于曼殊的身世,颇能知道清楚,最重要的一点,他佐证了柳亚子以为河合氏并非曼殊生母之说。但是,他与柳亚子所主张,亦有大同小异处,即曼殊生母为河合氏的亲戚,并非横滨苏宅的下女。^⑤此说颇有参考的价值。此外,罗孝明曾访问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沈燕谋(曼殊在安徽高等学校的同事);根据高伯雨的文章,追踪《曼殊上人诗册》在香港的下落,去信马德里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寻找曼殊的《燕子笺》英译。他最大的功绩,为苏曼殊幼妹苏惠珊的发现。惠珊是曼殊父杰生妾大陈氏最小的女儿,她生时(1902)曼殊早离香山县沥溪故乡,从未晤面,但在家中亦听到一些有关她长兄的故事。晚年苏惠珊长期居住香港,经由郑宗樑的介绍^⑥,罗孝明开始与她通信(1969—72),并提出有关曼殊身世的质疑书。在答复时,苏惠珊提供了一些她所知道的曼殊幼年在沥溪家塾读书时的情况,为新鲜的材料。这位幼妹亦承认曼殊生母并非河合氏,却以为她是河合氏的妹妹^⑦。至此,经由苏惠珊与陈国权的说明,我们对于这一点可以下一较为可靠的结论了。罗孝明有意为曼殊在日本所做的宣传工作,虽未能开展,但是他那发掘曼殊身世资料的努力与成就,却仅次于柳亚子。可惜,他为

① 根据他给我的第一封信,1964年8月16日。

② 以下所载,根据陈国权与罗孝明信。当时曼殊与河合氏聚晤二次,系在东京大森日本料亭,第二次河合氏重嫁之日本丈夫亦参加。时曼殊25岁,河合氏约60岁,其夫年龄相若,陈国权20岁。各种年谱,载曼殊重晤河合氏,在1907年,与陈国权所说差一年。

③ 一般以为苏曼殊精通日文,我曾以此点请罗孝明质疑于陈国权,答覆如下:“曼殊之日語,若是很简单的话,尚可勉强对付,但遇着曲折性之谈话,则颇有辞不达意之处。……曼殊在大同向习中、英文,故对于日文恐怕连平假名及片假名(日本字母)亦不甚了了。”罗孝明亦同意陈国权说法(1966年10月24日信)。

④ 曼殊在大同学校的同班生中,与郑文植、文塔兄弟最友善,二人之母关安子(日女)与河合氏情同姊妹,曼殊称之为亚姨。罗孝明母渡边氏即在关安子处看到河合氏。

⑤ 亲戚说系陈国权得自关安子处;下女说系苏维驥得自苏杰生妾大陈氏而转告柳亚子者。

⑥ 郑宗樑为郑宗荣弟,罗孝明大同同学,曾在香港主持旅日华侨同学在港联欢会事宜。苏惠珊在1969年有一次参加此会,因与郑宗樑认识。苏惠珊留港多年,曾从庄兆祥医师研究中医药,任教香港东华三院又学有二十余年之久。在1972年2月,她自加拿大返港,经过日本时,曾在机场与罗孝明通电话,但从未晤面。她于1973年从香港移居加拿大与子女同居。

⑦ 曼殊生母为河合氏的亲戚,不论是妹妹或侄女(陈国权推测),较为可信。这一点说明为何河合氏对曼殊在幼年时的鍾爱及以后重遇时感情的深厚。

曼殊作传的意图，未能完成，只遗下一册《曼殊大师传补遗》^①。

在与我通信期间，罗孝明曾设法与研究苏曼殊的日本文人，如增田涉与饭塚朗，取得联系。现在，且就他写给我的信上所说的，略述一些曼殊在日本文坛上的情况。最先对曼殊有兴趣的，为日本名作家佐藤春夫，早在1925年，他曾从在东京留学的田汉处，借读曼殊编的《汉英三昧集》，识得曼殊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之一彗星”。^②后来，当其友人增田涉（鲁迅作品的翻译者）去中国时，佐藤托他顺便调查曼殊身世之真相。增田涉在上海与鲁迅晤见（1931），鲁迅即以《曼殊全集》（柳亚子编的北新书局本）相赠。鲁迅并告诉增田涉，他与曼殊在东京相识，曾有刊行文学杂志《新生》的计划，后因经费无着，未能实现。佐藤春夫在“苏曼殊为何如人”一文中（发表在《文艺春秋》，1934年10月），曾提及此事，并根据《曼殊全集》书中材料，以为苏曼殊有完全的日本血统。增田涉亦有研究文字，对比苏曼殊与陈独秀，但未得发表，仅见佐藤春夫文中。就在这时期（1933年9月），在东京举行一个文艺家追慕展览会，怀念已故日本著名文人，如默阿弥，德富芦花，夏目漱石等，公开他们的遗物，而把苏曼殊亦列入其内，在会上展览出他的袈裟及著作文物多件。佐藤春夫，增田涉以外，日人研究苏曼殊者尚有米泽秀夫，^③池田孝，村上知行，饭塚朗诸人，其中以执教北海道大学的饭塚朗^④最为重要。早在大学读书时，他所写毕业论文，即以苏曼殊为题，此后（1930年代）曾在日本杂志上，发表有关曼殊之文章多篇。所译《断鸿零雁记》（附“绛纱”及“焚剑”二记）有1938年改造文库初印本，及1972年平凡社东洋文库重印增订本，收入新材料甚多。^⑤饭塚朗此书与我的英文《苏曼殊传》，于同年出版，罗孝明各购一册，以饭塚朗书赠我，我的书赠饭塚朗。此举可与田汉与佐藤春夫，鲁迅与增田涉，柳亚子与饭塚朗借书及赠书之盛意相比美，同为苏曼殊研究史上中日文化因缘的一段佳话。

最后，附带一提苏曼殊研究在台湾的情形。台湾文坛，对于苏曼殊亦有兴趣，有好几篇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但大部分并无研究价值。较值得提出的，为在《传记文学》上所刊出的苏惠珊的《亡兄苏曼殊的身世》^⑥，我的《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及刘昭明译的“亦诗亦画话曼殊”。^⑦最有趣的，在1965年出版了蒋一安的《曼殊诗与拟曼殊诗》^⑧一书，收集苏曼殊、燕子兔诗与译诗，蒋一安拟曼殊本事诗及其他杂诗，共若干首。这些拟作未知有何价值，但亦可见苏曼殊影响的另一方面。

× × ×

① 罗孝明于1973年5月在日逝世后，郑宗樾搜集罗氏所有研究曼殊的资料，编成《曼殊大师传补遗》一书，在香港印行（1975），为非卖品。

② 罗孝明与柳无忌信，1966年1月23日。

③ 所撰《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有徐蔚南中译《曼殊大师全集》附录，页46—54）。

④ 罗孝明在1965年曾与他在东京晤面，畅谈竟日，引为同志。

⑤ 《曼殊小说选》中多“非梦记”，“曼殊诗选”有诗30首，19题。另有文二篇：《苏曼殊之血统问题》，《苏曼殊之文芸作品》，及附录四种：“苏曼殊年谱”，“苏家略谱”，“苏曼殊著作目录”，“苏曼殊资料集录”，在“后记”中提及柳亚子曾自上海赠他北新版及开华版《曼殊全集》。

⑥ 简又文看到了罗孝明的《曼殊大师传补遗》，将其中苏惠珊与罗孝明的长信，加此题目，寄交《传记文学》发表。

⑦ 系柳无忌英文本《苏曼殊传》最后一章。

⑧ 附录中有“柳无”之《苏曼殊年谱》（最初稿），不知为何把我的名字腰斩了！

在最近（1980年代）开始的苏曼殊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接到成绩报告单，只能列举一些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限于与我有接触的几位作者。现阶段的曼殊研究，隔了一个长的时期，又回到国内的曼殊爱好者^①，如潘叔安，王玉祥，高肇州，任访秋等，曾发表有关曼殊的文章，如施蛰存，刘斯奋，曾编注曼殊的诗集；以及与我有联络的裴效维，马以君，李芸。我认识裴效维较早，当1981年秋在北京的时候，曾收到他的长信，讨论曼殊研究的几个问题。当时他在编辑《苏曼殊小说诗歌集》，此书已于1982年出版。李芸是王晶鑫的爱人，晶鑫有关于南社与柳亚子的著作多篇，李芸对于南社社员苏曼殊有兴趣，正在翻译我的英文本苏曼殊传。经由亡友罗皓岚的介绍，我开始与马以君通信，尚不到二年，他给我的信已有数万言。马以君有论述苏曼殊的文章，发表在报纸及杂志；他的《燕子龕诗笺注》一书，于1983年出版。他发现一部广东沥溪的苏氏族谱，为近年来对于苏曼殊研究资料的最大贡献。他曾与在香港的曼殊研究者罗建业通信，并在罗氏死后为文悼之。现在他正以全力编订《苏曼殊集》，可能成为此类全集中最完备的定型本；他又有编集《苏曼殊研究资料选》及撰写《苏曼殊年谱》（附苏氏宗谱与曼殊名号简介）的计划，亦在积极进行中。这种工作我乐于协助，并希望这两部大书的编印，将使此后苏曼殊的研究者，有所依据，不必再费时间与精力，从事蒐集与考证的工作。一旦曼殊研究的工具完成，他的作品的批评与研究就可随着开始。

依我的看法，这阶段的主要工作，在于以客观的态度，批判的眼光，评论苏曼殊的著作及翻译，分析其优点与弱点，从而为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地位及影响，作出一个新的、正确的估价。这是1950至1960年代的文学史作者所未能做到的。在这方面，我愿意贡献一些个人的意见，提挈大纲，描写轮廓，以为后人作苏曼殊研究的参考。首先，我们如果对于曼殊的思想行为，与交游，能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文章与诗歌。在苏曼殊的短暂的一生，由于国事的动荡不安，他的生活经历着几个变化多端的阶段。在日本横滨他就读于康有为门人执教的大同学校，但未为保皇党思想所染污。相反的，到了东京以后，他的思想突趋激烈，继之以实际的行动，学习陆军，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队伍，以推翻满州政府为宗旨的革命运动，当时所交的青年志士，有陈独秀，秦毓珊，黄兴，钮永建诸人。这种爱国精神，表达于他自东京返上海后所撰的文字，也导引他去香港投奔革命党人陈少白（孙中山友人），并企图暗杀康有为。就在香港的时候，他的生活忽然发生一大转变，他翻了一个筋斗，从革命志士变成受戒僧人，但其动机与经过已无从追究。所能知道的，他的出世并不与入世背道而驰。所不同的，此后他从学名“子谷”、“湜”，改为僧名“曼殊”，并有时穿上僧衣，留下造像。可是，当他在长沙、芜湖、南京教书时，他所交游的人士，还是一些革命党人，如张继，秦毓珊，陈独秀，赵声（赵伯先）诸人；在东京时，他与章炳麟及刘师培夫妇（当时提倡无政府主义，但后来失节）同寓；在上海时，他交了一些鼓吹革命的南社文人，如柳亚子，陈去病，叶楚傖等。后来，他在南洋^②惹班教书，忽然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十分慷慨激昂，遂于次年返国。在国内居留的数年中，或教书，或在报馆主笔政，他始终保持与同盟会会员如居正，田桐，邵元冲，戴季陶，杨沧白诸人的友谊。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机关总部，如民前的鼎吉里“夏寓”，民初的环龙路孙寓，他都住过；他与孙中山亦有交往。不

^① 在香港中文大学及马来西亚大学，也有研究生以苏曼殊作为他们写论文的课题。举一个例子，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王介英，毕业于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现在马来西亚大学读硕士学位，专门研究“苏曼殊”。

幸的，这几年却是袁世凯窃国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就是革命党人中间，亦不无意志消沉，生活放荡者，曼殊自不能例外。他的消极厌世的悲观论调，反映在他的作品与书信内；他过着涉足花柳丛中的腐败生活，亦无可讳言。一般说来，终他的一生，曼殊与革命人士的交游，他的爱国忧民的思想表现在文字内的，虽时断时续，却从未完全放弃。

曼殊在民国前期所发表的文章，如《女杰郭耳曼》（美国无政府党员），《呜呼广东人》，《秋瑾遗诗序》，与民国初年所撰的《南洋话》，《讨袁宣言》，“送邓邵二君序”等，都充满了革命热忱，与愤世嫉俗的情绪。这种情绪，偶而在曼殊的小说中亦可找到，但更突出的，是这些作品的浪漫风格，与清新超逸、温柔凄艳的文字。那种涉及男女爱恋的人情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亦有之，但与后期所标榜的写实主义，尤其是解放后持为文学正则的社会主义，却背道而驰，因此颇受批评。这个问题应受到相当注意。我们的看法，每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其时代特征与历史因素，在评价任何作品时，要看它们是否能代表或反映它们的时代，亦不能忽略它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小说而论，可能的研究课题，亦即批评的对象，为其主旨与内容，故事的构造，人物的描绘，以及文字的运用。曼殊的短篇小说，虽然大部分着意于青年男女之情的描状，但就在类似的故事与人物方面，如《碎簪记》，《绛纱记》，《非梦记》，亦有互异之处，应该个别研讨。譬如《碎簪记》，虽有一些偶然巧合的情节，但其构造较为严谨，人物亦有显著动人的特征，胜于其他小说。另如《焚剑记》及《天涯红泪记》（未完成，但在首二章亦可看出），则在爱情之外，兼有侠义的成份。^①而且，即在那些有浪漫气氛的小说中，亦不无对于时代的写实与讥讽^②。至于曼殊所撰最脍炙人口的长篇杰作《断鸿零雁记》，小说主角三郎之情感与理知冲突的叙述，异国风物与情调的描绘，均能引人入胜。这部“少年三郎的悲哀”，使读者想到《少年维特之烦恼》^③，二者同为悲剧式的、热情冲激、撼人心弦的爱情小说，自传性质的、划时代的作品。所不同者，维特自杀而歌德继续活下去，三郎弥天幽恨，而曼殊于数年后竟抱恨而终。谁知道：如天假以年，安知苏曼殊不会如歌德一般，摆脱了狂飚时期的感伤情绪，成为文坛上一位伟大的作家？

苏曼殊的天才，最能表现在他的诗中。如小说一般，这些诗以愁肠与情种见长，有许多名句将传诵于后世而不朽。诗是情绪的产物，曼殊的诗不但充满了悲伤的气氛，亦有美丽景物的描绘。举凡江南的风光^④，东瀛的情调^⑤，他都能写成一幅幅鲜艳的图画，活跃在纸

① 如《焚剑记》中的独孤公子，与《天涯红泪记》内的精通剑术的老叟。

② 《绛纱记》：“维时海内鼎沸，有维新党，东学党，保皇党，短发党，名目新奇且多，大江南北，鸡犬不宁”。在《碎簪记》内，对于美国之物质文明（“其人民以make money为要义”），颇为攻击，亦提到袁世凯称帝，欲以各省劝进之文件，译成外语，“均虚妄怪诞，詔谕便辟之辞”。《天涯红泪记》的背景，为哀鸿遍野的乱世其中有“残杀人民之某将军”。《焚剑记》所描绘的“季世险恶……沧海横流”的社会，更为可怕：洪水，暴兵，死尸，鬼村，杀人贼，恶毒心肠的富人，食人肉的、似留学生的将军。对于当时的留学生，尤有严厉的讽刺：“其人望族也，尝游学于大鹿国，得博士街，人称洋状元，今在胡人鬻饼之肆，任二等书记。”

③ 德国文豪歌德著，有郭沫若译本。“烦恼”亦可译作“悲哀”，更近于原文“Leiden”。

④ 如《吴门依易生韵》诗中的“暮烟疏雨过阊门”，“淀山湖外夕阳红”，“垂红亭畔柳波桥”；西湖白云禅院的“庵前潭影落疏钟”等名句。又如《简法忍》诗：“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

⑤ 如“柳阴深处马蹄骄”的莆田，“桃花红欹上吟鞭”的淀江道中，与《本事》诗第一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上,有异笔同工之妙。不仅此,虽然他自己说:“不爱英雄爱美人”,却也曾因为“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地伏在郑成功诞生处(在日本平户)的石碑前,在早期离日返国时,他要把孤愤的英雄泪,“洒上蛟绡赠故人”。这类的诗句虽然不多,亦可视为同一主题的异调。

在二十世纪初年,苏曼殊实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创始者,重大的功臣,诸如梵文的介绍,西洋文学的翻译,中诗英译的编集,有其辉煌的成就。这一点鲜为世人所称道,至近年来始渐受注意^①,所以应当特别提出。首先,我们可略述曼殊在梵文与佛学方面的贡献。他曾与章炳麟同撰《敬告十方佛弟子启》,与《告白衣宰官启》,署为“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广州比丘曼殊、杭州鄞波素迦末底(章炳麟)同白”;他并有《答马德利庄湘处士论佛教书》。这几篇文章,阐发佛学真谛,缕述佛教在中国,日本,印度,欧洲发展的情形,并对其前途表示关切。曼殊所撰《梵文典》八卷,今已失传,不知是否已全部完成^②,但亦足证明他对于梵文的兴趣与造诣。在撰写时他曾参考英人编著的梵文语法书多种^③。他涉猎中外群书,他的阅读与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博的。

于西洋文学之介绍,曼殊致力颇勤。他最爱好的诗人,有意大利的丹顿(但丁,Dante),英国的拜伦(拜伦,Byron)与师梨(雪莱,Shelley),德国的瞿德(歌德,Goethe)。他自称“丹顿拜伦是我师”,有《题师梨集》与《题拜伦集》诗各一首。在吊拜伦诗中有“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句,表示他对于拜伦身世的同情。在英文“《〈潮音〉自序》中,他以为“拜伦和师梨是两个英国最伟大的诗家”。他曾编译《拜伦诗选》,所收译诗有四十余首之多^④,在当时(1909)可称为破天荒的创举。其中“哀希腊”诗十六首,充满民族革命的情绪(当时希腊为土耳其所统治,拜伦曾为希腊之自由运动而奋斗),尤为脍炙人口^⑤。此外,曼殊尚译有十九世纪英诗人师梨,彭斯Burns,豪易特Howitt的诗各一首,瞿德的《题〈沙恭达罗〉诗》^⑥,与梵土女诗人陀露哆的《乐苑》。^⑦曼殊未习德文,早年是否通法文,颇成疑问。他所翻译法国文豪器俄(雨果,Hugo)的长篇小说《惨社会》(Les Miserable)可能是从日文或英文转译的。并不忠实于原著,改动甚多,穿插上杜撰的对于

① 在英文《Poets and Poetry of China's Last Empire》(翁聆雨Ranon Woon,罗郁正Irving Y. e. lo合撰,1965)文中,以严复,林纾,苏曼殊为清末三大翻译专家。另有大鹏发表之“译学先知苏曼殊——为纪念先生百周年写”(1983年)一文,前有“笔者谨识”一段,节录如下:“这位薄命才子,浪漫诗人,多情种子,同时也是革命志士,功在国故,总不该让大家给忘了。——我独认为他自有千秋,特别是他的翻译眼光,真可令人愧死。因此表而出之——同时更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翻译史,提供一份微薄的资料。”

② 《梵文典》原定八卷,仅成首卷其目录载《天义报》第6期(1908)。曼殊另有《初学梵文典》四卷,似为前书八卷之缩小本,今均已遗失。

③ 据陈独秀云,他曾供给苏曼殊英文书三种,今查得如下:Max mttler编《A 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s》,1866; monier—Williams编二种:An Elementary 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1846; A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1857.

④ 其中少数译诗,如《贺大海》可能经过章炳麟或黄侃在文字上的修改。

⑤ 此篇英诗,已知有六种中译(参阅本文注18),可见其受人欢迎。

⑥ 印度诗圣迦梨陀娑,撰《沙恭达罗》剧曲,扮演无能胜王与沙恭达罗恋爱故事。歌德之德文题诗,有英人Eastwick译文,曼殊重译为中文。

⑦ 印度女诗人陀露哆Toru Dutt之生卒年,为1856—1877,曼殊作1890—1908,不知有何根据。

中国政治，社会，人物的讽刺^①，鼓吹当时革命排满的思想。无疑的，这种译法并不可取，但如以翻文与原著相对照，指出曼殊改编的地方，亦可见其用心所在。至于他的另一部译作，《婆罗海滨逸迹记》，其作者“南印度瞿沙Ghochha”，不载印度文学史，原文亦未能查得，究竟为曼殊所译或自作，尚待考证，为曼殊研究者课题之一。

此处应当提出的，苏曼殊在日本印行的《文学因缘》，《潮音》，《汉英三昧集》三书所编录的一百余首的英译汉诗，并非曼殊本人所译^②，而是从各种西文书本内所选集的。曼殊所引用的英、法文书籍，就我查得的，已有九种^③，但仍有在《汉英三昧集》内的二十首左右的英译，未能找出原书。关于中文诗英译的问题，我一向注意，此次曾遍查我自己所有与司丹福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而仍未得全部完成此项复原的工作，可见曼殊采用书籍的广泛。在本世纪初，当中西文化交流尚在启蒙阶段，曼殊能有如此远见，从事中诗英译的选集与研究^④工作，做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绩，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总结我们在前面的评述，苏曼殊不仅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浪漫诗僧，他在现代中国文坛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位有革命情绪的爱国主义者，以爱情为主题、型塑了特出女性的小说家，禀赋灵性、多情善感的诗人，他也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翻译界的先知先觉。他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因此养成了他在后期中那种厌世的态度，放荡的行为，伤身的嗜好——这些他生活中的污点，终于戕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使他英年早逝。他的不幸遭遇，亦可视为对于这个黑暗时代的一种消极的抗议。在这方面，我国文学史上不乏前例，如屈原的厌世自杀，李白的春日狂饮，关汉卿的涉足花丛，与曹雪芹的钟情裙钗。倘使我们无视他们的历史背景与个人遭遇，仅以主观的批评，斤斤地诟病他们的那些时代性的弱点，我们将会抹煞这些伟大作家在诗、戏剧、小说方面的光辉的成就。在他诞生百周年纪念的今日，我对于苏曼殊亦有同样的观感。我并希望着，在现今这个阶段，曼殊的同情与爱好者，终将以他们精深研究的成果，为我在本文中对于曼殊的这种看法，加以证实，并进一步修正而发扬之，以奠定这位“中、日天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4年2月9日，于美国加州孟乐公园

① 出现于苏曼殊的《惨社会》中人物，有尚海的假爱国志士，在官府中的满州苟，祖获王党的、不爱险的报馆主笔，泥塑木雕的崇拜者。

② 颇有一些苏曼殊集子（如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及作者（如大鹏撰“译学先知苏曼殊”），误以这些英诗为曼殊所译，而列入他的作品中。

③ (1) Charles Budd, *Chinese Poems*, London, 1912. (2) George T. Candlin, *Chinese Fiction*, Chicago, 1898. (3) J. F. Davis,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London, 1870. (4) Herbert A. Giles,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London, 1898. (5) H.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1901. (6) D. HerveY de Saint-DenYs, *Le Li-sao, poeme du III Siecle avant Notre Ere*, paris, 1870. (7) W. A. P. Martin, *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 Shanghai, 1912. (8)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5 vols. Oxford, 1865-95. (9) William Wells, *The Middle Kingdom*, 2 vols. New York, 1883.

④ 苏曼殊论中西文学比较及翻译问题的文章，有《与高天樞书》，《*拜伦诗选*自序》，《*文学因缘*自序》三篇，立论精审，批评正确。